

陈 冰◎著



莫理循模式

中国报道第一课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福建教育出版社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ISTRIBUTING GROUP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莫理循模式：中国报道第一课/陈冰著.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7.3

ISBN 978-7-5334-7662-5

I. ①莫… II. ①陈… III. ①新闻事业史—研究—中国—近代 IV. ①G219.29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44525 号

Molixun Moshi

莫理循模式

——中国报道第一课

陈 冰 著

策划编辑：林冠珍

责任编辑：陈玉龙

美术编辑：季凯闻

出版发行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福建教育出版社

(福州市梦山路 27 号 邮编：350025 网址：www.fep.com.cn)

编辑部电话：0591—87812652

发行部电话：0591—83721876 87115073 010—62027445)

出 版 人 江金辉

印 刷 福州华彩印务有限公司

(福州市福兴投资区后屿路 6 号 邮编：350014)

开 本 890 毫米×1240 毫米 1/32

印 张 10.125

字 数 227 千字

插 页 2

版 次 2017 年 3 月第 1 版 201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34-7662-5

定 价 48.00 元

如发现本书印装质量问题，请向本社出版科(电话：0591—83726019)调换。

序 言

陈冰的博士论文付梓前夕，热情邀我作序，我欣然应允。陈冰是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的教师，2009年考入我的门下，在职攻读博士学位；不久前以优异成绩完成学业，顺利通过论文答辩。在职读博并非易事，阅读、研究任务之重可想而知，教学、育子又一样不能减负，为此只有更加刻苦、努力，付出双倍的辛劳。陈冰做到了，我由衷祝贺她。

陈冰的论文考察的是《泰晤士报》驻华记者、澳大利亚人乔·厄·莫理循有关清末政治的报道及其影响。从中国新闻史的角度看，这个选题有着重要的意义。外国人来华办报始于1815年，是年英国伦敦会传教士威廉·米怜在该会来华传教先行者罗伯特·马礼逊的支持下，在马六甲创办了第一家以中国人为宣传对象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由此揭开中国近代报业的序幕。此后，德籍传教士查尔斯·郭士立于1833年在广州创办了《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开外国人在中国本土办报之先河。1822年创刊的葡文报纸《蜜蜂华报》是中国境内（澳门）出版的第一份外文报刊，而《广州纪录报》则是中国大陆出现的第一份英文报刊。总体而言，无论是中文报，还是外文报，外国人在华创办的报刊对于中国近代报业的产生与发展均有着

直接的影响。正因为如此，外国人在华办报的历史成为中国新闻史学界关注较多的领域之一，这方面的研究成果相当可观。陈冰关注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她将目光聚焦于西方媒体的驻华记者，观察他们在华报道的内容及其与中国社会的关系，可谓视角独到。目前国内有关西方媒体来华记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以后来华的西方左翼记者，尤其是声名卓著的“三S”（斯诺、斯特朗、史沫特莱）身上，也有研究者将研究范围进一步拓展，延伸到斯诺夫人——海伦·斯诺的新闻实践与思想方面，但是对于早期西方驻华记者群体中其他重要人物的研究则比较少见，譬如对于《泰晤士报》记者乔·厄·莫理循的研究。

莫理循是外国专职记者驻华第一人，在新闻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然而长期以来学界有关莫理循的研究一直处于零散状态，缺乏系统性。陈冰的论文则基于史料的挖掘，在这方面进行了全面探索。为了充分再现历史过程，陈冰利用自己的语言优势，全面研读了《泰晤士报》电子档案数据库提供的莫理循在华期间撰写的所有报道（1897年至1912年），在此基础上对莫理循担任驻华记者15年间的新闻报道活动进行了考察分析。论文不但研究了与莫理循有关的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庚子议和、满洲危机、苏报案、丁未政潮、清末新政等事件报道的个案，透过报道内容，一窥他的专业理念，还深入到莫理循的社会关系网络中，透过各种历史事件检视他与中国清末政治的互动以及他由记者转而成为民国政要顾问的过程。这使论文不再局限于资料层面，而具有了广阔的社会视野和学术价值。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这篇论文既是对西方媒体驻华记者群体研究的补充，也是对新闻史研究的一个很好的补充。方汉奇教授

曾寄语青年学者“多打深井”“多做个案研究”，陈冰的论文亦可视为“打深井”的一部优秀的个案研究成果。

陈冰在论文写作的同时，还将莫理循的中国报道译成中文，译文达二十万字以上。这无疑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有助于人们进一步了解清末民初中国政治与社会的变迁，也将为相关领域的研究者提供不可多得的历史参照。作为博士论文的延伸性内容，期待它能早日出版，以饕大方。

历史研究者往往因资料、眼界或学识所限而力有不逮，陈冰曾向我袒露过这方面的担忧。在我看来，研究者的功力固然重要，而“功”和“力”所用方向更为重要。陈冰论文的难能可贵之处在于方向明确，路径清晰。假以时日，相信她会勤修不辍，功力大长。本书即是在论文基础上几经修改、调整而成，反映了陈冰认真严谨的治学态度。博士论文是研究者学术生涯的起点，期待陈冰继续努力，不断精进，更上层楼，是为序。

程曼丽

2016年11月于北京大学燕园

引言

就外媒驻华史而言，清末《泰晤士报》驻华记者乔·厄·莫理循是一个承前启后、里程碑式的人物。单论来华外国记者，莫理循不是第一人，但从他开始，西方大报和其他媒体机构一改此前的临时和特派记者惯例，开始向中国派遣常驻记者，因此莫理循是驻华记者的鼻祖，领驻华记者职业化和常态化风气之先。从1897年到1912年，莫理循在华从事记者工作凡15年，写下了大量关于清末时政的报道，即便在当今驻华记者行业里，这也是令人瞩目的资历和成就。这使莫理循成为驻华记者研究领域内一个不可多得的个体样本，通过对他的深入研究，可以管窥驻华记者与中国本土政治和社会的互动情况，并了解这个群体发展的渊源。在这样的思路指导下，本文以莫理循担任驻京记者15年的报道为线索，在分析莫理循报道在不同时期的新闻建构的基础上，结合考察同时期莫理循及其报道与清末重大历史事件之间的关系，主要探讨两个问题：一是莫理循报道的对华框架是如何建构及变化的；二是莫理循个人及其报道在清末特殊的政治历史环境中，特别是在列强竞争与朝廷政治这两个维度方面，处于一种怎样的角色，发挥过何种影响。

在经历了19世纪末列强划分势力范围及义和团运动的惨败

后，以1901年《新政上谕》的颁布为起点，中国开始走上了效法西方、由浅至深、自上而下的自我改革道路。与中国的历史变化相应，莫理循报道在呈现中国时也从早期的帝国主义单一框架转变为后期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改革派官僚视角相结合的复合框架。莫理循在早期对列强划分势力范围及铁路贷款合同之争的侧重，以及对义和团运动期间北京使馆被围和戊戌变法的帝国主义意识形态建构，表明这一时期莫理循眼中的中国仅仅是列强争利的竞技场，而非带有自主性的主权国家。新政初期，莫理循报道一方面延续上一时期的帝国主义框架，继续追踪列强在华角逐，揭露德国在联军行动中的恶行及俄国在满洲撤军问题上的虚伪，另一方面也对清末国内事务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关注，开始反映清末新政在社会稳定、西式教育方面的初步成效。1906年《仿行立宪上谕》颁布后，清政府改革进入以宪政和体制改革为目标的深水区，相继在1906年开始改革中央和地方官制、1909年成立咨议局、1910年成立议会准备机构资政院，并于1906年开始废除科举考试，清末社会与政治的重大变化是新政后期莫理循报道的重心从列强竞争转移到国内局势的重要诱因之一。从1906年到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这段时期，莫理循报道的视域是以中国为重、列强竞争为辅的，是一种糅合了帝国主义与改革官僚两个因素的复合框架。

莫理循报道不仅止于文字建构，在现实中对清末重大政治事件也构成了不可忽略的影响。莫理循报道与俄国侵占满洲问题、日俄战争、苏报案、丁未政潮等事件之间的关系，表明了西方舆论在清末政治中成为了影响时局、甚至改变权力结构的重要影响因素。莫理循报道的前后框架转变及其与列强竞争、朝廷政治的密切联系，使莫理循在除了具有与其同行报人所共

享的、维护英国国家利益的共性之外，还具有独特的个性。这种独特之处是由莫理循与以袁世凯为首的中国改革派官僚日渐深入的接触造成的，为其同行报人所不具备。本文将依循“议政”与“预政”的两条线索，从文字到个人，从报道到现实，对莫理循及其报道一探究竟。

目 录

引言 /1

绪论 /1

一、选题意义 /1

二、文献综述 /5

三、研究方法 /20

四、难点和创新点 /22

第一章 莫理循来华背景：列强瓜分狂潮与欧洲中心观 /24

第一节 19 世纪末国际列强的竞争与在华瓜分狂潮 /24

一、19 世纪末国际列强的竞争 /24

二、甲午战后列强在华瓜分狂潮 /26

第二节 中世纪以降的西方中国形象衍变与欧洲中心观 /30

一、中世纪至 19 世纪末的西方中国形象 /30

二、西方中国形象衍变背后的欧洲中心观及其对莫理循的影响 /36

第二章 帝国主义与列强竞争：驻华早期的莫理循报道 (1897—1900) /41

第一节 作为情报与竞争工具的莫理循报道 /42

- 一、莫理循关于俄国租借旅大的报道与俄英竞争 /42
- 二、对《增阿暂章》的披露与清政府的“以夷制夷”策略 /51

第二节 党派斗争与列强竞争框架下的戊戌变法报道 /57

- 一、莫理循对戊戌变法的报道与解读 /57
- 二、戊戌变法失败后英国及莫理循对维新派的营救行动 /61

第三节 义和团报道的帝国主义意识形态建构 /66

- 一、使馆被围前：从“中国的骚乱”到“中国的危机” /66
- 二、使馆被围：英勇的外国人与背信弃义的清政府 /69

第三章 庚子议和、批德驱俄与清末新政：新政前期的莫理循报道 (1900—1905) /81

第一节 庚子议和与批德驱俄 /82

- 一、从惩凶到赔款：对庚子议和的关注 /82
- 二、“在直隶的德国人”：对德军的尖锐批评 /99
- 三、莫理循的满洲报道与日俄战争 /104

第二节 改革之光：新政初期报道 /124

- 一、《新政上谕》拉开的改革帷幕 /124
- 二、主线下的副线：莫理循的新政报道 /127

第三节 濮兰德、莫理循的苏报案舆论与政治干预 /135

一、濮兰德、莫理循引导的《泰晤士报》苏报案舆论潮 /135

二、濮兰德、莫理循的苏报案舆论框架及影响 /139

三、濮兰德、莫理循对苏报案的政治干预 /145

第四章 中国局势与朝廷政治：新政后期的莫理循报道 (1906—1912) /158

第一节 中国局势：从弹到赞与帝国主义两面性 /159

一、新政后期的清末改革与社会变化 /159

二、觉醒的帝国：莫理循的新政后期报道 /160

第二节 朝廷政治的站位：莫理循与改革派官僚 /180

一、晚清政府对外交往的观念与实践 /180

二、莫理循与中外人士的交往 /185

三、作为袁世凯及改革派官僚“编外幕僚”的莫理循 /189

第三节 朝廷政争的关键：丁未政潮中的莫理循报道 /208

一、丁未政潮的背景 /208

二、莫理循报道与瞿鸿禨的失势 /210

第五章 莫理循的新闻观兼与同行报人的比较 /218

第一节 莫理循报道与《泰晤士报》及英国政府之间的关系 /219

一、第四权力与无冕之王：19世纪末西方新闻与政府的关系 /219

二、国家利益下的离与合：莫理循报道与《泰晤士报》及英国政府 /222

第二节 莫理循报道的特点 /226

一、对华框架的灵活性 /226

二、莫理循报道的权威性 /231

第三节 莫理循与《泰晤士报》同行报人的比较 /236

一、莫理循与姬乐尔：新闻原则与从官原则的对立 /236

二、莫理循与濮兰德：对中国改革前景的迥异判断 /240

三、对中国改革的看法产生分歧的原因 /246

第六章 莫理循在外媒驻华史的地位 /252

第一节 莫理循在外媒驻华史的地位 /253

一、莫理循是首位西方大报驻华记者 /253

二、莫理循在清末政治中的角色与影响 /258

三、莫理循文件与报道的史料价值 /262

第二节 以古鉴今：莫理循时代对当下对外传播工作的启示 /265

第三节 莫理循辞职从政的原因 /270

一、性格：四处游荡，渴望成就大事业 /270

二、感情：与报社上司交恶、与袁世凯交好 /271

三、境遇：职业厌倦，疾病缠身，经济窘迫，准备结婚 /272

结语 /275

附录 《泰晤士报》与《纽约时报》的苏报案报道比较 /278

参考文献 /294

后记 /307

绪 论

一、选题意义

本论文的选题意义大致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就国内莫理循研究现状而言，从中国外媒驻华史的角度来专门研究和评价作为记者的莫理循是对目前国内莫理循研究的补白。作为当时大英帝国的子民，莫理循于 1862 年 2 月出生于澳大利亚季隆，在澳大利亚和英国接受教育，获爱丁堡大学医学博士学位。1897 年 35 岁之际被《泰晤士报》派遣来华，任中国常驻记者，长居北京。民国成立后，莫理循受袁世凯之邀出任民国政府首席政治顾问，为包括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在内的几届民国大总统提供内政外交方面的咨询服务。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莫理循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之一赴法参加巴黎和会。那时，莫理循已经身患重病，并于 1920 年 5 月卒于英国伦敦，终年 58 岁。莫理循与中国结缘始于 1894 年，当时他初来中国，在不懂中文的情况下以一身中式打扮单枪匹马横穿中国西南腹地并写成游记《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这本书使他获得了《泰晤士报》的青睐，被聘任为该报驻华记者。1897—1912 年，莫理循是英国《泰晤士报》驻北京首席记者，也是当

时外报首位专职驻华记者，他的任命一开外报来华记者职业化的先河。从此，在外媒来华记者团队中，除了诸多临时记者和特约通信员，多了常任驻华职业记者的身影。这些驻华职业记者不仅深度报道中国的政治和社会变迁，也深切地参与到中国的历史进程中，既是见证者，也是参与者，发挥了不可小觑的影响。莫理循在 1897 年至 1912 年间长达 15 年的中国报道见证了清末社会所经历的一切重要历史事件和时刻，如列强 19 世纪末在华的利益争夺、俄国在满洲的活动、义和团运动、北京使馆被围、八国联军侵华、庚子议和全过程、清末新政、立宪运动、辛亥革命、清帝逊位等。他的报道使《泰晤士报》成为当时欧美报纸中报道中国问题的权威，他本人也被称为“北京的莫理循”或“中国的莫理循”。可以说，莫理循的报道和他保留下来的日记及各种资料，是清末乱世和变局的活标本。而莫理循报道因其要在权威报纸上公开出版，所记载之事又比私人日记具有更高的可信度，因此报道虽不乏个人偏见，也可作为信史来阅读，为后人一窥时人时局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然而，莫理循本人及其报道虽具有如此的重要性，其所获得的总体研究关注却少得可怜。21 世纪初，当国内一位出版界编辑想了解莫理循的研究现状时，她“翻遍了人民大学复印资料《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没有一点儿线索；又向几所大学历史系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袁世凯研究’的教授咨询，仍没什么收获。借来《袁世凯演义》、《袁世凯传》翻阅，奇怪的是，好像袁世凯压根儿就没有这么一个顾问。查找了《中国近代史词典》，居然也没有‘莫理循’词条”^①。莫理循在国内研究视野

^① 林冠珍. 寻找莫理循 [J]. 中国编辑, 2003 (1): 78—82.

中的“寂寂无闻”直到2003年莫理循传记《北京的莫理循》中文版出版和2005年窦坤的《莫理循与清末民初的中国》出版后始有所改善。迄今为止，国内为数不多的莫理循研究成果更倾向于研究他作为袁世凯和民国政府顾问的一段历史，从新闻与政府的关系及中国外媒驻华史的角度研究莫理循的记者生涯，在整个莫理循研究框架中尚未得见。莫理循乃先以《泰晤士报》驻京记者的身份奠定声名，他的记者生涯长达15年，比他仅7年的顾问生涯长得多，取得的成就和获得的肯定也更多。作为无冕之王时的莫理循是意气风发的，当总统顾问时的莫理循因意见不受重视则是郁郁失意的。如果说担任总统顾问是莫理循个人历史的“后传”，那么从事记者工作则是他的一段“前传”，如果不能很好地理解“前传”，就不能恰当地理解“后传”。研究莫理循，如果不详细考察他作为记者的一段历史和文字，终究是不完整的。

其次，从中国新闻史的角度看，对莫理循的研究，是外媒驻华史与驻华记者研究的溯本与补充。自戈公振著《中国报学史》以来，中国新闻史教材在论及近代在华外国人外报时，研究焦点一般放在外国人来华办报上，很少触及外国报纸或通讯社驻华机构和记者。究其原因，或许是因为外媒机构和记者的驻华历史比外国人来华办报历史要晚几十年，有能力派遣驻华记者的外媒数量也不多。自1815年到19世纪末，外国人在华共创办各类中、外文报刊近200种，占当时我国报刊总数的80%以上。与之相比，从19世纪70年代起，外媒才开始在中国设立分支机构。最早是英国路透社，于1872年在上海建立远东分社。1897年，《泰晤士报》任命莫理循为驻京记者，开启外报驻华记者的时代。从研究的角度看，外媒驻华记者虽然是个规模